

林超民 文集



第
一
卷

林超民文集

第一卷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林超民文集. 第 1 卷 / 林超民著. —昆明: 云南人民出版社, 2008

ISBN 978-7-222-05441-7

I. 林… II. 林… III. ①林超民—文集②民族学—文集③人类学—文集④史学—文集 IV. K0—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176797 号

责任编辑 张 波

封面设计 杨晓东

责任印制 洪中丽

书 名	林超民文集(第一卷)
作 者	林超民
出 版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
发 行	云南人民出版社
社 址	昆明市环城西路 609 号
邮 编	650034
网 址	www.ynpph.com.cn
E-mail	rmszbs@public.km.yn.cn
开 本	787×1092 1/16
印 张	28
字 数	480 千
版 次	2008 年 12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 刷	云南国浩印刷有限公司
书 号	ISBN 978-7-222-05441-7
定 价	180.00 元(第一、二卷)

尊敬的读者:若你购买的我社图书存在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我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发行部电话:(0871)4194864 4191604 4107628(邮购)



方国瑜教授是引领林超民步入学术殿堂的恩师



江应樑教授指导林超民完成博士论文



通过博士论文答辩后,云南大学前党委书记兼校长、中共云南省委副书记高治国向林超民和导师江应樑表示祝贺并给与勉励



梁钊韬教授(中)与吴泽霖教授(右)希望林超民不断进取,更上层楼



林超民在民族学与民族史学习中得到杨堃教授的多方指教



向杨振宁教授介绍云南历史与文化的



张椿年、黄留珠、金冲及、李文海、龚书铎、林超民（从左至右）



与费孝通教授、李亦园院士在国际会议上亲切交谈



马曜、田汝康教授是林超民深受教益的良师



林超民在香港中文大学向饶宗颐（中）、谭振常教授请益



中国人类学学会会长陈国强（左）、中国民族学学会会长宋蜀华（中）与林超民在峨眉山金顶



李埏教授是林超民敬仰的导师



李芸、林超民拜会香港中文大学校长金耀基教授（右二）、人类学系主任吴燕和教授（右一）



向中国文献学会会长刘乃和教授请教



与中国社会学会会长郑杭生教授伉俪在昆明



与章开沅教授在广州崇化考察



与冯天瑜教授（中）在内蒙古锡林郭勒草原

谢 词

本文集是我1978年9月师从方国瑜教授学习中国民族史与地方史以来的学术记录。

有生以来，自己每前进一步都得到父母培育、师长教诲、学友襄助、家人体贴。其深恩大德、高情厚谊、仁爱慈惠，我刻骨铭心、没齿不忘。

衷心感谢我的导师方国瑜教授、江应樑教授！

衷心感谢我的父亲林树焜、母亲谢庭芝！

衷心感谢我的诸位师长：马曜教授、李埏教授、杨堃教授、李德家教授、缪鸾和教授、张德光教授、马开樑教授、李为衡教授、马忠民教授、李英华教授、尤中教授、木芹教授、熊锡元教授、杜国林教授、徐文德教授、武希轅教授、张尚谦教授、赵瑞芳教授、方德昭教授、谢本书教授、朱惠荣教授、黎家斌教授、罗秉英教授、吴继德教授、郑志惠教授等！

陆韧、树才、永进、先林、海梅、周琮、顺宝、王璞、文辉、立英、志芬、国保、亦武诸位与我同门同窗同事，多年来在一起切磋学问，商量旧学，增益新知，深得他们的热情关爱、无私帮助，给我终身受益，铭感之情难于言表。

黄纯艳教授、杜娟教授、甘雪春教授、刘本军教授、李洁教授、袁国友教授、李东红教授、王世丽教授、周智生教授、马勇教授、黄兴球教授、宇应军编审、郑卫东编审、黄显松编审、王东昕博士、王燕飞博士、王艳萍博士、杨丽娥博士、姚珏博士、西绕云贞博士、陈元惠博士、高志英博士、林谦一郎博士、浦哲文博士(Dr.Jeef Book)、华思文博士(Dr.Steven L.Watkins)、立石谦次博士



以及诸多学友与我教学相长，互有启迪，谊属同舟，感纫无既！

衷心感谢云南人民出版社的王晓燕社长，尤其感谢副总编李惠铨先生和责任编辑张波女士为我的论文集的出版所付出的心血！

陈国保、辛亦武、赵启燕、付春诸位贤棣为我整理、校对稿子，尽心尽力，求善求精。铭感殊深，特鸣谢悃。

我的兄弟姐妹自幼相亲相爱，无时不在关心、帮助、支持我，恭录他们的名字以表谢忱：林健民、林虹民、林韵民、林达民、林静民。

妻子李芸自我们相知相识以来，始终与我携手并肩，相扶相助，相亲相爱，相濡以沫，相敬如宾，无需把心头的谢意再次表白，也无法用语言表白！

儿子林涛、女儿林涓没有辜负我的期望，这就是对我最大的安慰，他们给我的欢欣自不必言谢。

老树春深，苍龙日暮，天高路远，山重水复，我当不负师友亲人，自强不息，奋蹄向前。

林超民 谨识

2007 年元旦

自序

早在二十多年前就有几家出版社约我编辑个人“论文集”，不少师友也鼓励我将发表于报刊的文章结集出版。当时，学者出版文集为一时之风尚，前辈、同侪、新俊的论文集层出不穷。我自知学力有限，所发表论文虽有新见，但不免粗疏，需要进一步打磨、推敲、提高。更主要的是，我的业师方国瑜、江应樑两位教授于1983年、1988年先后辞世，他们留下了许多工作需要我完成。我自有心愿：导师的遗著没有整理出版，就不考虑我个人著作的出版。婉谢了出版社与师友的好意，多年来我一直专心整理先师遗著。

1978年9月我考取云南大学中国民族史专业的研究生，师从方国瑜教授学习中国民族史与云南地方史。当时，方国瑜老师的大作《中国西南历史地理考释》与《云南史料目录概说》已经整理完毕，请人誊写清本。清本为繁体字，无标点，国瑜师命我认真阅读，并将这两部书的校对、标点定为我的日常功课。近半年，在国瑜师的指导下顺利完成了校对和标点工作，为我日后的学业奠定了良好的基础。这两部书交中华书局，于1984年、1987年先后出版刊行。倍感痛心的是，这两本凝聚国瑜师一生心血的大作，他已不及见到。

其时，方国瑜老师编定的《广韵声会》一书和《困学斋杂著》（五种）也请人誊写清本，等待出版。国瑜师发表于期刊的论文，已刻印散发的文章，未刊的手稿，大多誊写就绪，约百万字。国瑜师命我协助整理，编为《滇史论丛》四辑。上海人民出版社编辑李文俊先生负责出版。1982年9月《滇史论丛》第一辑问世。国瑜师殊为高兴，命我加紧工作，希望尽快将其余三辑出版。岂料，国瑜师于1983年12月23日中午突发脑溢血，24日清晨驾鹤西游。国瑜师留下的遗著是国家、民族的珍贵学术遗产，整理出版国瑜师遗著是我责无旁贷的义务，应该毫不犹豫地勇担起这项工作，心无旁骛地完成这项工作，将方国瑜教授在中国民族史与云南地方史做出的创造性成果尽快出版，奉献于学术界，告慰先师的亡灵。



1981年我通过硕士学位论文答辩后，国瑜师即命我整理《马可·波罗行纪“云南行纪”笺证》，于1982年初完成。蒙方先生赞许，希望尽快出版，参加当时正在国际学术界开展的马可·波罗是否到过中国的讨论。此书先在《西南古籍研究》上分两期刊出，直到1994年1月才由民族出版社正式出版，此时距方师逝世已经十年。算是国瑜师诞辰九十周年，逝世十周年，我献给先师的一朵小花。

国瑜师逝世后，《滇史论丛》的出版成了问题。我多次与责任编辑李文俊联系，先说“正在研究”，其后杳无音讯。1990年我开始筹措经费着手国瑜师遗著的整理与出版工作。承蒙云南教育出版社何学惠社长鼎力支持，三卷本的《方国瑜文集》计划在1993年方国瑜先生诞辰九十周年时出版。1994年8月《方国瑜文集》第一辑问世。由于诸多因素，第二辑、第三辑未能继续出版。直到1998年在何学惠社长的全力支持、无私帮助下，《方国瑜文集》的出版工作才又启动，并将原来的三辑改为五辑。在众多师友的帮助下，2003年在方国瑜先生诞辰一百周年、逝世二十周年之际五卷本《方国瑜文集》出版。2004年《方国瑜文集》获得云南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特等奖。

国瑜师于1965年开始编纂大型史料丛书《云南史料丛刊》，当年底《云南史料丛刊》第一辑的油印本问世。不料第二年“文化大革命”动乱骤起，这项工作被迫停顿。1978年国瑜师与徐文德、木芹两位老师从头开始《云南史料丛刊》的编纂工作。国瑜师拟定计划，提出方案，徐文德与木芹教授具体纂录校订。潜心工作三年后，《云南史料丛刊》油印57辑，基本完成纂录校订的工作。1983年初夏，国瑜师与徐文德、木芹、郑志惠老师一起，讨论了《云南史料丛刊》的出版问题。决定以57辑的油印本为基础，重加编次、校订，依时序、按内容编为20卷，每卷约30万字，大32开本。并与云南人民出版社文史编辑室主任李惠铨编审联系出版事宜。不料年底国瑜师仙逝，《云南史料丛刊》的出版便搁置下来。在省政府和云南大学的关心支持下，1988年《云南史料丛刊》第一辑由云南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但我们为《云南史料丛刊》得以出版的兴奋心情未能延续多久，由于各种原因，《云南史料丛刊》的出版再次搁浅。经过多方努力，克服不少困难，1998年2月新版《云南史料丛刊》第一卷由云南大学出版社刊行问世。经过三年多努力，国瑜师主编，徐文德、木芹、郑志惠纂录校订的《云南史料丛刊》13卷全部出齐。国瑜师生前念念不忘，费尽一生心血的《云南史料丛刊》的问世，得到中外学术界的广泛称道，赞誉四起，好评如潮。

江应樑教授在国瑜师逝世后担任我攻读博士学位的指导教师。我获得博

士学位后，协助应樑师编纂《江应樑民族研究文集》，并于1992年由民族出版社出版。令人扼腕痛心的是，当这部体现应樑师五十年研究与教学经验的大作问世时，他老过世已经4年了。

1983年应樑师组织同仁修订1961年由方国瑜、杨堃、江应樑、尤中诸位老师合作撰著的《中国民族史讲义》。1985年5月我获得博士学位后，应樑师命我协助他编著《中国民族史》。期间，有几位教师先后退出编写工作。更不幸的是，书稿尚未完成，应樑师于1988年11月11日夜间心脏病猝发，抢救不及，遽返道山。作为江应樑教授的学子，我理所当然地继承先生遗志，与师友合作，完成应樑师未竟事业。应樑师逝世两年后的1990年11月，民族出版社出版了江应樑先生主编的《中国民族史》上、中、下三卷。这部《中国民族史》获得了国家教育委员会首届全国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一等奖，首届郭沫若历史学奖。

1985年我被推举为云南大学历史系副主任，1988年担任历史系主任。云南大学历史系是中国历史学人才培养与科学研究的重镇之一。历史系教师兢兢业业、踏踏实实地在教学与科研上做出了显著成绩，可是他们的科学研究成果的出版十分困难。为推动科学研究，提高教学质量，促进学术交流，我筹集资金，在1993年云南大学建校70周年之际，编辑出版“云南大学史学研究丛书”和“云南大学民族研究丛书”。先后出版了赵瑞芳、熊锡元、马开樑、李英华、吴继德、黎家斌、杨兆荣等老师的论文集。为帮助青年学者尽快成长，我募款为中国民族史专业和民族学专业的硕士编辑出版了《新松集》、《新浪集》、《新凤集》、《新叶集》、《新翼集》。争取学校与社会支持，编辑出版“云南大学中国民族史博士文丛”，已有五种问世。

1995年3月，忽膺云南大学副校长之选。我本来是个可以做点学问的人，从未想到要从事行政管理工作。出任副校长后，我在学校的头衔颇多：计划生育委员会主任、老龄工作委员会主任、知识分子保健小组组长、残疾人协会主席、消防委员会主任，还要担任逝世的教授、副教授、处长们的治丧委员会主任。几乎每天都得为师生日员工的生老病死操心费神。时常要见许多不愿见的人，要说许多不愿说的话，要穿不习惯的礼服，要参加不自在的宴会，还要吃不见得有益健康的大餐。每天工作何止八九个小时，甫到家里，电话铃频起，不速客常来。长年如此，尽管心里难免有些嘀咕，但还是龟勉从事，不敢稍有懈怠。自己钟爱的读书写作只有在夜深人静时做上两三小时。

蹉跎岁月，忽焉十载。转瞬间年届花甲。承蒙领导关心照顾，得以退出行政工作，回到书房，重操旧业，收心补读少年书。此时云南人民出版社的



副总编李惠铨学长再次建议我整理旧作，出版文集。孔子说：“君子以文会友，以友辅仁。”《诗经·小雅·伐木》有吟：“嘤其鸣矣，求其友声。”发文出书，广交学友，得到同仁、同道、同行的批评教正，借以提高进步，实为人生快事。欣然同意将旧作董理结集出版。自觉德薄言轻，才疏学浅，不足以传世，然一得之愚，一孔之见，或有可取，芟陋就文，齿录己见，冀有补学术，岂敢祸枣灾梨！

自1978年9月我从西双版纳州勐海县第一中学到云南大学跟随国瑜师学习中国民族史和云南地方史，开启学术生涯以来，深感自己资质笨拙，唯以勤能补拙自励。与多才多艺、多能多产的学者相比，实在惭愧。数年间发表于报刊的长文短章，超过百篇，还有序言、书评，杂文、随笔又有一两百篇。经过一年多的整理，从论文中选出58篇。这些文章大多在学术刊物上发表过，有的则是在学术会议上发表过，有几篇是从我的硕士论文中选编的，还有几篇选自我为《滇云文化史》一书写的有关章节。这58篇文章，是我从事教学与研究的记录。可以分为中国民族史与地方史两大类。民族史可以分为概论、文献、唐代民族史、云南民族史诸部，地方史又分为文化、交通、社会、经济诸部。有3篇文章是纪念导师方国瑜教授的。国瑜师逝世后一周，我即写成《方国瑜传略》，先在《民族工作》1984年第二期上发表，补充后发表于《史学论丛》1987年卷。这是最早介绍国瑜师生平与学术贡献的传记，但本文集没有收入。《名山事业 薪尽火传》是《云南史料丛刊》的后记，介绍国瑜师主编《云南史料丛刊》，为云南史料研究与整理作出的前无古人的巨大贡献。《博雅精深 学高身正》是在纪念国瑜师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发言，《云南日报》作了转载。《文章惊天下 道德著春秋》是在2007年5月14日方国瑜故居开馆庆典及方国瑜先生与民族文化学术研讨会上的主题发言稿的基础上写成的。云南大学民族学的科学研究与人才培养与周恩来总理的指导、关心、帮助分不开。可以说，没有周恩来总理的教诲，就没有云南大学民族学科的建设与发展。为此，为纪念周总理诞辰100周年我写了《在周恩来总理的指引下——记云南大学民族学的教学与研究》，收入中共云南省委党史研究室编的《情系南滇——周恩来与云南》一书中。这篇文章也算是云南大学民族学学科发展的小史，收录在文集中供有兴趣的学人参考。20世纪70年代我曾在普洱茶产地之一勐海茶厂当工人，对普洱茶可谓情深意长。当时查阅资料，做过一些笔记，曾在《云南日报》上发表过几篇关于普洱茶的短文。师从国瑜师研究民族史与地方史，就普洱茶历史向国瑜师请教，国瑜师以旧稿《普洱茶》赐示，我整理成《普洱茶史话》发表在《民族文化》1980年的创刊号上。当时

知道普洱茶、喜欢品饮普洱茶的人还不算多。文集收录三篇关于普洱茶的文章，算是在勐海茶厂工作的一点纪念，也是给予我朝夕相处的工人师傅们的菲薄献礼。最后一篇《明道不计功》收入王文章和侯样祥先生编辑的三卷本《中国学者心中的科学·人文》。这套书邀请114位科学家撰文纵谈“科学”、“人文”、“科学人文关系”，我有幸忝列其中。这篇文章写了自己的治学经历、治学方向、治学志趣、治学体悟，也算是自己的治学小结。

原本只想汇编为一集，不料编排下来，一集难于容纳，便分为两卷。第一卷为概论、文献、唐代民族史、云南史概论、先秦至宋代的云南史等专题。第二卷为元明清至民国的云南史、白族形成、汉族移民、交通、茶叶、纪念国瑜师等专题。由于原来是作为一集编排，所以只写了一个后记。现在也按照原来的编排，一二卷合起来写一个后记，想必不至于引起误解，贻笑大方。

在学术的道路上，自己没有做出大的成就，没有任何可以夸耀的业绩，值得宽慰的是，自己做了承上启下的薪传工作。师从方国瑜和江应樑教授，获闻余绪，增益新知。虽领悟不深，领会不全，但只要稍有心得便牢记于心，身体力行。忝为研究生导师，虽才疏学浅，力有不逮，但总是尽心尽力、尽职尽责。现在国瑜师的隔代弟子陆韧、秦树才、潘先林等已经成为21世纪的博士研究生导师，正在培养新世纪的民族史、历史地理、边疆史、地方史人才。喜看新人茁壮成长，方国瑜、江应樑等导师们开创的事业薪火相传，倍感心满意足，欢欣鼓舞。收入文集的文章虽然都是自己的独到新见，但也与师友们的帮助分不开：一方面来自师长们的教导启迪，一方面也来自与学棣们的切磋探讨。每念及此，总是对给予我帮助的诸位导师学长、仁兄贤棣，由衷致谢，心存感激。

回顾自己走过的路，深感庆幸，虽然自己愚钝笨拙，但是得到时代、社会、师友、父母、家人的眷顾。我走过泥泞、坎坷、曲折的路，我经历过挫折、冤枉、打击，我有过遗憾、委屈、悔恨，我忍受过痛苦、磨难、伤心，但是比这些更重要的是，面对艰难困苦、风雨雷电，我没有胆怯、犹豫、退缩，我昂首挺立，独自支持，独善自养，独立思考，独行特立，独出机杼，一往无前，百折不回。我的生命是渺小的，但我的生活是充实的；我的生命是脆弱的，但我的生活是坚强的；我的生命是伤感的，但我的生活是欢乐的；我的生命是短暂的，但我献身的学术生活是永恒的。

从中学到大学，我们是毛泽东主席所说的“早上八九点钟的太阳”，充



满了希望与憧憬。现在，已是太阳偏西时分。敏感的诗人，既有对夕阳一往情深的赞赏，又有无可奈何的慨叹。我无暇顾影自怜，更无需惆怅哀叹，志在千里的老骥，不会伏枥不前，在无谓的感叹中虚耗有限的时光，让壮心消泯。

2008年10月于补拙斋

生存与发展：中国民族关系五十年

(1950~2000年)

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中华民族是以汉族为主的56个民族组成的。汉族人口最多，占全国总人口的91%以上。其他55个民族约占全国总人口的9%。因这55个民族在全国总人口中的比例较小，一般称之为少数民族。虽说是少数民族，可是人口的数量不少，总数已超过1亿。据1990年全国第四次人口普查，中国少数民族的总人口约为9135万；据1995年的人口抽样调查，全国少数民族人口已达1.08亿。

中国少数民族中壮族人口最多，约1500多万；珞巴族人口最少，约2300多人；人口规模相差悬殊。人口在百万以上的少数民族有18个（蒙古族、回族、藏族、维吾尔族、苗族、彝族、壮族、布依族、朝鲜族、满族、侗族、瑶族、白族、土家族、哈尼族、哈萨克族、傣族、黎族）；人口在10万至100万之间的少数民族有16个（傈僳族、佤族、拉祜族、水族、东乡族、纳西族、景颇族、柯尔克孜族、土族、达斡尔族、仫佬族、羌族、仡佬族、锡伯族、畲族、高山族）；人口在10万以下，一万以上的有12个（布朗族、撒拉族、毛南族、阿昌族、普米族、塔吉克族、怒族、乌孜别克族、鄂温克族、德昂族、裕固族、京族、基诺族）；人口在1万以下的少数民族有8个（保安族、塔塔尔族、独龙族、鄂伦春族、门巴族、珞巴族、俄罗斯族、赫哲族）。“高山族”是目前中国内地对台湾原住民的统称，包含泰雅、布农、排湾、卑南、阿美、雅美、鲁凯、赛夏、曹等族群在内。此外，中国还有约70万左右的人口要求将他们识别为少数民族。

在中国，“少数民族”这一称谓丝毫没有歧视、贬低的含义，仅只是指人口在总人口中占比例较少的非汉民族。除个别例外，中国少数民族的人口主体大多分布在中国境内。除个别例外，中国少数民族大多数是在中国境内在长期历史发展中形成的，他们和汉族一起，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相互依存、相互交融，共同形成中华民族。

中国作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拥有人口众多的少数民族。超过1亿人口的少



数民族的存在，使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活诸方面都受到民族关系的影响。正确处理民族关系是中华民族生存与发展的重要前提之一。

20世纪50年代以来，中国废除了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的制度，贯彻实施国内各民族一律平等的政策，开创了中国民族关系史的新篇章，谱写了各民族团结友好、共同生存与发展的新乐章。

1. 实现平等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开创了中国民族关系的新纪元。做了国家主人的中国各民族人民，第一次建立起各民族人民平等、团结、互助的社会主义新型民族关系，开始了各民族相互依存、相互交流、共同发展、共同繁荣的新时期。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实行团结互助，反对帝国主义和各民族内部的人民公敌，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为各民族友好合作的大家庭，反对大民族主义和狭隘民族主义，禁止民族间的歧视、压迫和分裂各民族的行为。”1954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各民族一律平等，禁止对任何民族的歧视和压迫，禁止破坏民族团结的行为。”“在发扬各民族间的友爱互助，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各民族内部的人民公敌，反对大民族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的基础上，我国各民族团结将继续加强。”1982年12月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重申和进一步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各民族一律平等。国家保障各少数民族合法的权利和利益，维护和发展各民族的平等、团结、互助关系。禁止对任何民族的歧视和压迫，禁止破坏民族团结和民族分裂的行为。”中国几个不同时期的根本大法，都明确规定了各民族一律平等的权利和他们之间平等、团结、互助的关系。1984年5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中又明确规定：“民族区域自治是中国共产党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解决我国民族问题的基本政策，是国家的一项重要政治制度。”“实行民族区域自治，体现了国家充分尊重和保障各少数民族管理本民族内部权利的精神，体现了国家坚持实行各民族平等、团结和共同繁荣的原则。”《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规定的少数民族当家做主的权利，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的原则，对于增强全国各民族人民的大团结，巩固和发展中华民族历史上形成的巨大凝聚力，加强少数民族自治地方的社会稳定、经济发展和文化建设都具有重大意义。